

目 录

“九·五惨案”中的于渊·····	王传玉 (1)
临解放射洪的反共部署·····	朱继林 胡治国 (7)
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兵役政策·····	郭怀冰 (11)
国民党军队经理浅谈·····	文显瑞 (15)
射洪的抗日募捐宣传·····	吴汝成 (26)
卢沟桥事变在南充师训班的回响·····	罗奇兆 (29)
空军英雄猛扑敌机·····	胡治国 (31)
遂宁空战和炸后惨状记实·····	衡元梯 (32)
侵华日寇在战场上发射毒气弹·····	杨善培 (34)
川军健儿血战滕县·····	刘万山 (36)
忆长沙二次会战·····	文显瑞 (39)
回忆娘子关战争·····	衡量 (44)
“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的回忆·····	吴汝成 (47)
我在旧军队中经过的一些战争·····	敬治国遗稿 (50)
民国时期射洪县的农业贷款·····	张崇福 (58)
爱树老翁文省章·····	陈昌利 (59)
同棉花枯萎病作斗争·····	杨荣生 (61)
国民党时期中医改进引起的风波·····	任达夫 (76)
一代名医蓝逸庵·····	杨久安 (80)
天晓得抄手和天津包子·····	蒋子卿 (82)
三台武德社与香山哥老会的一场风波·····	汪肇容 (86)
杜甫故事三则·····	田老泉 (89)
封面设计书画：孙竹篱	

“九·五惨案”中的于渊

王 传 玉

于渊名光藻，别号邦齐，四川省射洪县龙宝乡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

于渊年轻时对旧社会就愤愤不平，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常与土豪争斗，由此惹下了“大祸”，远离家乡，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在军阀时代的行伍中，他为人正直，主张正义，英勇善战，谋略过人。当他以战将闻名的时候，年龄才三十多岁。

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滚滚潮流，震撼着一切倾心革命的志士仁人。于渊清楚地看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祸根，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此时此刻，于渊心潮翻滚，热血沸腾，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他到重庆莲花池找到了共产党在四川的军事领导人杨闇公、刘伯承，同他们建立密切联系。这时于渊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敌人的营垒里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特别是在万

县的“九·五惨案”中，于渊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成为人们颂扬的反帝英雄。

一九二六年七月，伟大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穿的连裆裤，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镇压。正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他的主子英帝国主义，便急急忙忙增派一些军舰开进长江，向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力量进行示威挑衅。他们的轮船和军舰在川江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故意撞沉和浪翻川江木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仅在这一年的六、七两月在万县附近就撞沉和浪翻木船四起，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的这些罪行尚未得到清算，于八月二十九日又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当天英国太古公司“万流”轮，在云阳江中招致飘船，接送行客。这时，解送军饷的于渊所属宪兵一连，欲搭乘该轮转回万县，便雇了三支木筏驶向“万流”轮。“万流”号的英国人，明明看见木筏已经靠拢，有的正在登轮，但它却故意开动机器，加快航速，掀起巨浪，致使三支木筏顿时沉没，上尉夏云奇、刘作舟等五十多名官兵全部溺水而死，还沉没枪支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余发，饷款（银元）八万五千元。木筏沉没时，英国人还在轮船上手舞足蹈，挤眉弄眼，观望溺水者取乐。

事件发生后，担任万县宪兵司令兼城防大队长的于渊，得知这一噩耗，怒不可遏，发誓要向英帝讨还血债，当即下令肇事英轮“万流”号停泊待命，而该轮却置若罔闻，竟然扬长而去。这时于渊赶紧向坐镇万县的二十军军长杨森报告，同时又向正在万县做杨森工作的党代表朱德、陈毅等汇报和商议斗争策略。朱德指示，要抓住这一事件，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击英

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迫使杨森和吴佩孚割断关系，转向国民革命军，促进北伐战争。朱德又向杨森提出，要强行扣留英国轮船。于渊一面在军内外积极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控诉、请愿、声援和示威游行，一面说服杨森要当机立断，严惩英轮。杨森其人是依附于吴佩孚的军阀，开始思想惧怕犹豫，军内也有一部份军官主张“和平”解决，搁平了事。但是，革命的洪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杨森亲眼看到，他部下的官兵和大江南北的民众，呼声震天，尤如火山爆发；同时，朱德是以党代表身份提出的扣轮问题，他不得不慎重对待；而且朱德曾与他在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中共过事，还救过他的命，旧交关系也需要在表面上应付一下；再说，这次事件是直接搞到他的头上，火烧到了后背，如果就此罢息，觉得自己的脸上也不光生；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节节推进，他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鉴于以上种种原因，老奸巨滑的杨森，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暂时顺应潮流，表示愿意按朱德和于渊的意见办。八月三十日，杨森下令扣留停泊在万县江面的英国“万县”号和“万通”号两首轮船，受命于渊去执行扣轮任务，同时打电话给重庆英国领事馆进行交涉。

当日上午，长江上空被阴云笼罩，江面雾气腾腾，于渊率领一个手枪排，驾着两支木船，直奔英轮而去。住在船上的英国佬，眼见中国官兵到来，先是以蔑视的眼光，不瞅不睬，继而用武力威胁，不准中国官兵靠近。这时，早就不把帝国主义看在眼里于渊，带领士兵强行冲了过去，跳上轮船甲板，用大刀横砍顺杀，给他一个下马威。英国佬确是一只纸老虎，一戳就穿，那里招架得住，只得规规矩矩投降，最后被一个一个地关进两间舱室里拘留起来。

早有预谋的英帝国主义，一面派驻重庆领事在万县邮政局应付谈判，一面密令驻在汉口的英国海军副司令，将停泊在宜昌的“嘉禾”号轮加以伪装，内置大炮和海军作战部队，由舰长扎尔礼率领，于九月五日下午五时驶抵万县后，汽笛长鸣，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口就把中国人全部吞下，随即同停泊在万县的英舰“柯克捷夫”号，以及由重庆开下的英舰“威警”号形成犄角之势，准备向驻守二轮上执行扣留任务的中国官兵进行攻击。但见他们的人都被关进舱室里，没法脱逃，于是又改变战略，由“嘉禾”号和“柯克捷夫”号夹靠“万通”号，妄图用武力劫走，一个一个吃掉，当时从“嘉禾”号上走下一个白头发的英国海军老头儿，身穿白色海军制服，佩带金色肩章，胸前挂一排勋章，提着手杖，在二十几名英国水兵护卫下，趾高气扬，登上“万通”号，他指指搦搦地骂了一通之后，又恶狠狠地命令英兵赶走中国士兵。这时正在“万通”号上的于渊，怒目圆睁，下令固守，严阵以待。英兵见威胁无效，便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守船士兵二人。有个英兵欲向于渊开枪，于渊眼疾手快，把头一闪，子弹从额边飞了过去，微微有点擦伤。接着他飞起一脚，猛地把英国老头儿踢翻在地，连喊“打！打！打！”中国士兵立即动手，顷刻打死了十几个英兵摆在船板上。其余英兵见势不妙，有的惶惶逃命，夹起尾巴便跑，有的俯在甲板上，跪地求饶。那英国老头儿腹背中弹，头被刀砍，倒在血泊中，一命呜呼。后来才听说这个老家伙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赫赫有名的海军将领，也就是英帝派驻武汉的那个海军副司令。于渊估计敌人一定要报复，迅即命令士兵将“万通”号的所有英国人，一齐押到驾驶台前站起，脑部向内，眼睛向下，不准动弹，若有违抗，立即处死。

弄得英舰官兵束手无策，举棋不定，开枪，怕伤他们自己人，不开枪，又觉得“大英帝国”这次实在丢脸，只见这群穷凶极恶的野兽，在舰上捶胸顿足，暴跳如雷，活象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慌乱一团。

英舰被击败之后老羞成怒，把那老将喂了鱼更是如丧考妣，此时兽性大发，凶相毕露，把大炮对准万县南北两岸，疯狂轰击三个小时，发射炮弹三百余发，顿时万县城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瓦砾遍地，血肉横飞，最闹热的南津街和最雄伟的“万州旅馆”也被化为灰烬，死伤军民千余人，毁坏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达二千余万元，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当英舰开炮射击的时候，杨森的炮兵也曾北岸进行还击，但是由于武器质量低劣和技术上的问题，未能对英舰形成威胁。这时于渊心急如焚，肝肠欲断，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冒着枪林弹雨，跑步面见杨森，坚决要求派兵封锁川江，为万县父老兄弟报仇雪恨。杨森认为摊子摆大了不好收拾，迟迟不敢表态。于渊一再请求，讲了许多精忠报国的道理，并发誓就是自己粉身碎骨，也死而无怨。一席话说得杨森开不起腔，隔了一阵，杨森才问道：“除了封江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于渊斩钉截铁地回答：“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内脏的办法组织敢死队同敌人决一死战”。杨森点头之后，于渊立即组织敢死队，号召部下的官兵说：“英帝国主义如此残杀中国人民，我们是中国官兵，拿起武器不同敌人撕杀，气节安在？良心何存？不怕死的，跟着我来！”官兵们人人磨拳擦掌，个个奋勇争先，一齐涌向于渊身边。敢死队出发，每人腰系手榴弹，身背大刀，手拿短枪，分乘木船，船头堆置沙包作掩体，伏到船中。这阵，天时已晚，江中船只隐约可见，在夜

幕的掩蔽下，木船顺流直向敌人冲去。英军对我炮击之后，正在耀武扬威，争功论赏，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官兵还敢前来交战。当他们发现时，木船已贴近，要想动手，为时已晚，措手不及，远射程大炮也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被动挨打，束手待毙。我敢死队便一齐开枪，猛掷手榴弹。只听得杀声震天，鬼哭神嚎，敌军大部阵亡。一刹时这艘军舰的尾部又中弹起火，浓烟滚滚，弥漫长江。另一艘军舰见势不妙，在舰上密集布防，妄图阻止我敢死队攀援。于渊凭自己过硬本领，纵身跃上敌舰，打开缺口，三百名敢死队员奋勇登上，一场激烈的近战响彻天江，打得英军魂飞魄散，尸横甲板，英舰副舰长和英军十余人毙命，余者纷纷投河，葬身江流。战斗尤酣，身旁一位连长上前拉着于渊急呼：“团长，你受伤了！”于渊同志说：“带伤怕什么，赶快冲杀！”话音刚落，不幸一弹从于渊左太阳穴穿入，伤及要害，当场倒下。士兵为了抢救于渊上岸，撤回原防，送到万县法国天主教医院抢救。在这次战斗中身负九处重伤的于渊，在昏迷之际还不断高呼：“给我狠狠地打！”英军经过这次沉重打击，不敢恋战，向下流落荒而逃，当晚在云阳的古林沱龟缩一夜，不敢开灯，次日拂晓又偷偷向宜昌方向逃去。

于渊直接指挥的这次战斗，打得英勇顽强，捍卫了民族尊严，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全国人民莫不拍手称快。可是两面三刀的杨森，在反动的北洋政府和吴佩孚的支使下，在这以后又向英帝妥协，不仅没有迫使英国赔偿“九·五惨案”中的巨大损失，反而将已扣的两艘英轮全部释放。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以后，杨森感到于渊是他部队潜在的威胁，于同年五、六月间，便借故解除了于渊

的军职，之后，于渊又到军阀刘湘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继续进行斗争。

临解放时射洪的反共部署

朱继林 胡治国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加强反共部署，建立地方反共武装，发动各县富绅子弟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充当反共骨干，同时加强大巴山防务，力图拒共军于川外。他调集各县的国民党书记长，特分会秘书，民众自卫总队长和总队附，集中在成都中央军校受训。射洪这次被调参加受训的有吴先荣、田访丞、王道周、谢英等人。

这批人受训后回县，即建立五人小组，以党部书记长吴先荣，县长吕嵩云，特分会秘书田访丞，民众自卫副总队长王道周，省派民训督导员衡尊武等五人为小组成员，吴先荣任组长，田访丞任书记。五人小组是全县反共组织的指挥部，是防共工作的领导核心，各大、分队附的选派，各乡的武器调集和修理，警察中队的扩编，大、分队附的训练，都由五人小组决定。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成立射洪县民众自卫组训总队部，县长吕嵩云兼任总队长，县参议会选出王道周任副总队长，谢英任总队附，四川省政府另派民训督导员衡尊武负组织训练等辅导责任。

县以下在各乡设立民众自卫大队部，乡长兼任大队长，由县总队部另派军事娴熟的人任大队附，保设分队部，保长兼任分队长，另在富绅子弟中选拔一人任分队附，大、分队部成立后，对当地青年壮丁施以军事训练。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射洪民众自卫组训总队部举办民众自卫组干部训练班，由县长吕嵩云兼任班长，副总队长王道周兼任教育长，训练地点在太和镇中学，训练对象为各乡、保大、分队附，受训人约四百人，训练时间定一个月，训练内容军事训练外加反共教育。

民国三十八年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因解放军胜利渡江，即将进军西南，令飭各县加强反共力量，扩大地方武装。射洪奉令后，即着手扩编各乡警察队。原来各乡镇警备队规定为一分队，从此每乡改编为一中队，一般为二分队，象金华、太和等乡镇就是一个中队的编制，就当时的编制情况看，全县有一团多人的反共兵力。

同年举行军事大检阅，把全县各乡镇警察中队和各乡镇民众自卫组训大、分队集中在金华，接受四川省第十二区专员李泽民的检阅，并聆听他所作的反共讲演。那次各乡镇来的人不多，由于情况急剧变化，情绪低落，就是来的也是采取应付态度。

三十八年射洪县民众自卫组训总队部奉令成立政工室，省会派吴先荣兼主任，开展政治训练和宣传工作。

国军胡宗南部所辖三三二师，移驻射洪整训，师长严正，师部直属各部队驻射洪（金华）、太镇、柳树各一团，同时设立射洪县军警联合办事处，以该师参谋长任主任，吴先荣任副主任，军警联合办事处成立后，还设有检查站，检查来往车

辆。这个机构的建立，本来是维持军风纪的，但俨然是以战时的姿态出现，无形中增加了紧张气氛。三三二师驻射洪仅半年时间，就奉命开拔，临走时射洪各机关法团还组织盛会欢送。

解放军进军西南，四川突告紧急，胡宗南和曾扩情等在绵阳筹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任主任，曾扩情、林树恩、王元晖任副主任。曾扩情在绵阳曾召开七县工作会议。这七县是绵阳、三台、射洪、盐亭、北川、安县、梓潼等，参加对象是七县中的党、参、政、自卫总队部、中学校长等各单位首长。射洪出席的人有邓泽民、马宗鲁、吴先荣、李长彬、王道周、朱继林等六人。主持会议的人是曾扩情、林树恩、王元晖等人。会议内容是指示各县集中现有武装力量阻挠解放，和在边区范围作长期顽抗。具体部署和作法另有命令。会议后不久，解放军已临重庆了。

重庆刚解放，射洪受震动，国军胡宗南部胡长青军移驻三台、射洪，在射洪武南一带勘察地形准备作战，要求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提供通讯联络，仅住两天时间，一切刚开始部署，突然奉命开赴中江待命，在射洪的一切策划均作罢论。

重庆解放后，射洪县政府奉命作紧急部署，决定把政府机关迁往复兴乡另作新的安排。到十二月五日，国军大部过境完毕，射洪县府才全部转移。当时迁到复兴的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民众自卫组训总队部、金华镇公所和金华警察中队以及县警察中队等少数单位，其他机关人员临时都溜走各保家眷去了。

跑到复兴去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中，如吴先荣就好似惊弓之鸟，立足未稳又跑到盐亭玉龙去了，剩下的人只有李长彬，王道周、田访丞、董正中、吴受天、朱继林、谢栋材等，还有为数寥寥的群众相随。最后县长李长彬得到遂宁专员李泽民

的电话指示，以遂宁专区为反共游击纵队的组织，专员李泽民任纵队司令，射洪为反共游击总队组织，县长李长彬为总队长。李长彬当即在复兴乡公所召集会议，宣布专员李泽民的指示后，随即宣布射洪游击总队的安排，李长彬称自己担任游击总队长，王道周任副总队长，吴先荣任政工处长，田访丞任副处长，下设三个大队，汪泽一大队长，吴受天二大队长，（三大队长拟议何代云或罗方鉴另作最后决定）。并将会议组织情况电知全县各乡镇，立饬将各乡镇警察中队集中听编。一区集中在复兴，二、三区另电通知，粮食因复兴征收处，农民多系代金完粮，存粮无几，东岳积粮多未运出，确定把东岳征收处的粮食挑运到复兴来。以上部署没有得到各乡镇的反应。李见无人响应，情况不佳，于晚上约集董正中、田访丞、谢栋材、吴受天等在复兴小学校计议，李将射洪县印交与董正中，托董行使县长职权，又说专署已迁到中江，他到中江请示专员，如何进行，以后再通知你们，旋即挥泪告别。同李长彬去的有吴受天、黄德友、赵秉中等。李走后随来复兴的人，见大势已去，有的回家，有的隐匿在亲友家中。县长李长彬一离复兴，民政科长董正中即迁射洪县府于复兴小学代理县长职权，随同人员于复兴街头满贴反共标语。董仅历时三日，由于射洪解放，即销声匿迹，只留县印于复兴乡长赵会彬家。直至一九五零年二月李长彬被逮回来移交时，才派赵泽润将印与李长彬送去。

李长彬离开复兴之次日，复兴自卫警察二队人员，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分驻于灵华、文昌两处山头严阵以待，并组织警丁于青杠垭、水洞山、盐土地等要塞来回巡逻。乡长、大队长分头扎好米袋，开仓碾米；还调集各保公私枪枝交付铁匠铺打成戈矛，按其反共部署作好负隅准备。

农历十月下旬，一支国民党溃军路过复兴时，暗将一批枪枝售于复兴自卫队。此批枪费乃用国民党政府摊派之棉衣、军鞋款项，全部枪费均付银元。乡公所以此款购来枪枝后，在乡小学下水井湾演习时，始知复兴有两挺轻机枪，二十支步枪。此枪于一九五零年射洪县大队编制各乡警察队时才随带交公。

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兵役政策

郭 怀 冰

抗日战争以前实行募兵制（即雇佣兵制），各部自行招募，自行扩充。当时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国内的军队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中央军，即所谓黄埔系的王牌军队，由蒋介石直接指挥，按月发十成薪饷（即现时的工资待遇），装备精良，待遇优厚。一是地方军队，即所谓杂牌军队，每月所发薪饷，系由各地财政收入来决定，七成八成五六成不等，装备方面，有啥穿啥，有啥拿啥。如新疆的盛世才，西北的马步方、马鸿逵，四川的刘湘、邓锡候，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等等均拥有军队，由他们这些地方长官直接指挥，表面上属于中央归蒋介石统治，而内部确实是四分五裂。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央和地方一律改为义务兵制（即征兵制）。由蒋介石统治的军政部，内设兵役署，由程泽润当署长，下设征募、编练、总务三处和国民兵司。这就是国民党

中央的兵役机构。各省设军管区，各省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专设参谋长，主管业务。在省属专员公署，设师、团管区，县设兵役科和国民兵团，由县长兼团长，专设副团长，主管国民兵的编制训练。兵役科长专管壮丁征集任务。国民兵以年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为甲级国民兵充当现役。年满二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为乙级国民兵充当后备役，担任后方勤务。征兵实行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拿兵役法令政策来看，好象很合理公正，但蒋介石的法令政策，多如牛毛，都是貌似公正的，实际上执行起来却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最严重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发国难财，他们驱使其爪牙在国内各地，横行霸道，贩卖烟毒，武装走私，抢购黄金、白银，套购外汇，收割地皮，无所不为。征兵当然也是他们的生财之道。他们弄虚作假，贪污舞弊，上行下效，无恶不作，弄得国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多年中，任过验兵队长，常备大队长，国民兵团副团长，补充团长，团管区司令等职，我特举例说明蒋介石的征兵政策在各个时期的罪恶。一九三八年，即抗日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在四川成渝两地设立驻蓉驻渝壮丁验编处。我在前方部队被打垮回川，但任驻蓉壮丁验编处队长，专门负责验收各县壮丁，转交各补训处，再由各补训处整训后转送前方补充。其中经过一个实例：有一个新都县的联保主任（即乡长），姓温，一般人都称他为温大爷。他送壮丁贪污办法是，一不带壮丁，二不要护送人员，他一人带上他在乡间收割的很多壮丁费，来在成都后，在各城门找到流氓头子，招集一批天兵流氓，造上乡保的花名册子，每人三元五元不等，集队前来验收。这些人被验收入伍后并不逃跑，

每天仍然请假出街闲游，等我们转交补训处后离开成都时，他们再行逃跑。他们多次顶名出卖壮丁，为什么我们不加取缔？由于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河水不犯井水，同时与我们利害相关。因为他们来在我们队上，多数时间不在队上生活，我们在伙食上有结余，而且上级点名交送他们能够及时返队，队上差人，他们还可代为找人前来顶名充数。乡保交丁时，对我们验收人员还要送点礼物。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乡保甲长接兵人员和天兵流氓都是互相勾结沆瀣一气。

我再举第二个例来说明蒋介石兵役法的抽签办法，一九三九年，我由四川军管区派任渝酉师管区巴县团管区江北县常备大队长，一个管征，一个管训，验收出征壮丁，就地训练后转交补充团队。壮丁一入营后，形同囚犯，日夜轮番看守，大小便都要报告。出征壮丁遭受苦难，哪能想到保家卫国，只想逃得性命回家。整训期中生活待遇每人每月碾米45斤（新秤16两归斤），在各地军粮仓库领取，当中多数是存仓滥米。壮丁吃不饱穿不暖，夏天每人一套单衣，冬天每人一套棉衣，一床单人被，一床草席。更兼部分连长克扣士兵伙食，更难吃饱。部队出发，病了不要，沿途抛弃，使病兵带病讨饭回家，死了埋葬不好，暴尸露骨。以上种种影响恶劣，人民誓死不愿充当壮丁。为了满足前方兵员需要，只有实行兵役法的抽签办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这样一来就又给乡镇保甲大开财门。有钱的人先向乡保行贿，当然免去抽签，到了抽签大会那天，藉故他去就可过关。有势的人，乡保不敢惹他，当然不去抽签，只有穷苦人民才是抽签的对象。谁人能去，谁人不去，乡保甲长心中早已有数。我曾亲去各乡镇参加抽签大会，监视抽签，见到各乡保长将适龄壮丁集合一起，准备点名抽签。本来

签筒内之签，应该分为两种，一是中签一是不中签混合一起，事前用红纸封固，表示慎重。其中骗局，就是钱能通神，乡镇保甲，事前将钱行贿上级监视抽签人员，钱能通神的神，就大施法力，把筒内不中签之签全部毁去，只留“中签”二字之签。到时，大家才进行抽签仪式，监视人员当众扯去红纸封条，并将签筒摇上几摇，由保长点名适龄壮丁亲自上台抽签。适龄壮丁上台后，自以为我未必就抽中，殊不知钱能通神的神早已注定，只要你一来抽便是中签。台上中签，台下就放鞭炮、戴光荣牌、大红花，在火炮声中护送中签壮丁光荣出征，这就是蒋介石的兵役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骗局。穷苦人民受骗以后，有苦难言，鸡蛋又不能去碰石头，只有消极抵抗，下次再遇抽签大会，白天上山，夜晚回家，窜逃各地，四处隐藏。因此，抽签骗局最终彻底失败。

我再举第三例来说明蒋介石的兵役政策。由于前方战事失败，整军整师逃散，急待补充，抽签办法又行不通，只有实行硬派，规定各乡各保，照月交出固定数量的壮丁，（这是一九四零年以后这段时间），地方乡保无法完成规定数额，只有实行抓丁政策，白天路上抓，夜晚旅店抓，穷苦人民宅前宅后抓，部队卖丁缺额也要抓。只要是男子不分年龄大小身体好坏，一律抓去抵数。抓来的人一要收腰包，二要剥衣服，三要代为“保管”行李等项。明系抓丁，暗行抢劫，被抓被劫人的银钱货物，不敢再来领取，倘若前来，就说他是逃亡壮丁，把他捆走，再去顶名充数。穷苦人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忍痛摧残自己的身体，宰去右手的食指，或者损坏右眼。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抓我抓，抓来抓去，就抓出祸事来了，使蒋介石下不了台。事情是这样的，重庆某部抓了一名壮丁，是一

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亲属大学生，不幸患病死了，没有埋葬，那中央委员找到蒋介石，把兵役署长程泽润叫去查询此案。蒋介石当时在盛怒之下，亲自打了程泽润几手杖，抓兵的团营连长，立即枪毙。这件案子，引来当时的盟友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的非议，认为中国的国家元首亲自出手打人，中国太不民主。同时也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兵役署长程泽润虽然有失职守，但罪不应死，而蒋介石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咀脸，暗示他的爪牙军法执行总监，判处程泽润“利用兵工建修私宅”的罪行，于抗战胜利前夕，在土桥将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执行枪决，抓丁打人一案，才就此了结。

国民党军队经理浅谈

文 显 瑞

一、军队经理的建立

国民党军队经理的建立，自一九二八年军委会军政部成立起始。当时按资本主义体制，以人员、马匹、经理、卫生为军队组成的四大要素。军政部主持军政，核定全军人马编制和预算，下设军需署，担任军费收支经理，物资后勤补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军需署长周俊产，浙江人。副署长熊仲韬，南昌人。军需署就业务分三个司：（一）财务司——主管全军经常费、临时费、金钱收支出纳。（二）粮秣服装司——主管全军

人粮、马秣、被服、装具的筹办补给。（三）军械司——主管全军枪炮、弹药、刀械、器材的供应和补充。随后军政部专设了兵工署于湖北办起了“汉阳兵工厂”，担任全军自产枪炮、械弹、器材等的筹划和制造，并相继办起了军需工厂。如武昌制革厂（负责军用马鞍、装具、皮带、军鞋等的制造），汉口制呢厂，汉口被服厂，长沙被服分厂（缝造军用单衣、棉衣、大衣、衬衣裤等）。军队经理补给程序，由部队及机关按经常费、临时费、军需物资预算，向军政部请领，由军需署所属司处按月直接拨给。

二、经理后勤扩展变化

国民党军队于抗日战争前数年在江西、两湖等地打内战，和一九三五年执行所谓二万五千里行军追剿作战，军需经理业务人员，逐有增加。抗战兴起，全国军队包括各省地方军，一致对外抗日，统由军政部筹划补给，开支剧增，军需浩繁，军队经理工作，由平时补给转入战时补给任务。经理后勤机械随之扩展增设如次：（一）军委会下增设后勤部，担任全军粮秣、被服、装具、枪械、弹药、器材等军需物资后勤补给。（二）于战区设兵站总监部，集团军设兵站分监部，军、师设兵站支部、站、库，执行战地物资运输补给任务。（三）原军政部军需署专任全军军费收支筹办。（四）于军委会行营所在地设军需局，战区设军需局办事处，担任战地军费发领。（五）军政部下增设会计处、审核处，战区设会计分处，负责军费收支账务工作，及事前事后审核。如抗日战争中，第九战区湖南、江西两地设置的经理后勤机构：1.担任战地军需物资运输补给的有第九兵站总监部，第一、第二十七，第三十